



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诉讼原则,各级公安、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,都必须严格依法、文明执法,要讲事实、重证据、不轻信口供,把案件办成铁案,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

如何让案件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”?难也不难。办案部门只要确立正确的诉讼理念,依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和法定权限,在现行诉讼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和证据规则下,围绕事实、证据和定罪量刑的标准展开侦查、起诉和审判活动,就能够达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、保护人权的目标。

案件审理一定要依法律、

讲证据,尤其是公安执法、侦查活动,应当更加强化办案和刑事追诉行为的正当程序和证据意识。这是因为,作为涉嫌违法、犯罪的被侦办人员、犯罪嫌疑人,其权利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。但长期以来,在执法办案人员的思想中,却一直存在着“口供中心主义”的意识,在违法犯罪嫌疑人“孤立无援”甚至较为封闭的侦查环境下,侦办人员也最容易产生“地位优势”的某种行为冲动,甚至使用非正当手段乃至采用刑讯、变相刑讯等方法取得犯罪嫌疑人的“供述”。

因此,为了尽力防止违背

法律原则和侵犯人权的不当取证行为的发生,国家对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第三方介入(比如辩护律师参与)、合法性监督(比如同步录音、录像)、讯问地控制(比如不得带离看守所)等,都在刑事诉讼法中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。同时,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犯罪证明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标准,更设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。如果事实材料确实是“真”,但审讯时经非法手段强迫获得,司法机关也应当依法予以排除,不能采信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在庭审阶段,对案件证据来源合法性审查的

严格程度,以及他们的独立判断地位及能力,将直接决定对某些案件事实的认定,很大程度上左右被告人的最终命运。

人们通常认为,立案侦查案件,就是要查明案件事实,为了“破案”和“抓人”,最终将犯罪者送上法庭,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样的思维有“群众基础”,甚至得到有些地方领导的肯定。某些办案人员虽也强调“证据”,但对证据的理解,往往容易淡化其中的“合法性”要素。而事实上,对犯罪行为能不能在公开、正当的程序下进行追诉,司法行动的“合法性”如何,正是一个国

家民主、法治和文明程度的标志,也是这个国家公共权力能不能受到依法、有效控制的缩影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我们甚至可以说,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,反映着普通公民在这个国家的实际“生存状态”和面对公权的到底会有多大的“安全感”。

就此而言,国家采用合法、文明的方式去证实违法乃至犯罪,可能比实际上处罚了几个“事实上”的违法者、犯罪人更为重要,也更值得人们去加以深度关切。我国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入宪,以及在此后刑事诉讼法中的重申及对证据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制度的

调整、改革,其实都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要求和实现程度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对办案侦查机关尤其是各级公安部门提出“侦查办案要由‘抓人破案’向‘证据定案’的目标转变”、“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‘破案’与‘庭审’的要求结合起来”,并进一步深化探索“以审判为中心”的诉讼制度改革,无疑是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,符合国家司法民主和法治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未来方向的。(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法学教授、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)

葛优躺

叶开



打下“葛优躺”这个词时,我带着一种细微甜感。在《我爱我家》这部二十年前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里,葛优演一个二流子,老是人家里来耍赖,动辄就说要晕过去了,赖在沙发上不起来。这部电视连续剧是我青年时期的记忆——这么一说,把葛优、英达、宋丹丹、杨立新等导演和演员都说老了。但时间公正地分配到每一个人的身上,不多不少。人人俱老,非常正常。当时我没注意到“葛优躺”这个特殊姿势。当时,一家四口,是杨立新、宋丹丹、关凌,再加老家长(老革命)文兴宇,他们四人是这部剧的四角,一张桌子,靠他们撑起来。葛优是帮忙友情演出的。

我当时是自视甚高的文学青年,读书虽未破万卷、胸中自有百万兵。或者说,凡是国产的,都归为二流。什么是一流呢?例如,一定要说情景剧,那么《成长的烦恼》是一流,《我爱我家》是二流。这个判断带有浓重的“媚外”态度。当时也并不觉得该剧多值得看,而且,那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,更没有可以放得下电视机的客厅(连电视机都买不起),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看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了。

1993 年 7 月首播至今 24 年过去,整个世界完全不同了。我们这个世界,可以分为“互联网前”世界和“互联网后”世界。在当前,我们思考问题,首先依靠互联网,是一种“互联网思维”,在当时,我们是纸质书思维,而电影、电视,只能作为一种思维的协调剂。现在看当时葛优的身板,那种精确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。“葛优躺”就是在剧中的一个很

特别、很赖皮的姿势。这种姿势,出现在画面里,自然不美,但代表了一个很特殊的“北京瘫”的典型状态。这样的“瘫”姿,并非葛优的发明,而是一个无所事事,有些无聊,赖皮,不自重,自我鄙薄的意思。

借助于“互联网思维”,发现很多人已经发掘出了各种“葛优躺”的“深刻意义”,而且,还复活或者说创造了“北京瘫”这个词,归纳了、总结了“北京四大瘫”,为首大哥,自然是“葛优躺”的创始人了。

这个“躺”不是在床上,而是在沙发上。葛优到别人家里,而且是一位老干部家里,不仅不是恭恭敬敬正襟危坐听老革命讲那火红岁月的感人故事,而且是对“老傅”的不敬,也是对整个“贾家”的不敬。

今天再热“葛优躺”,不再是“鄙视”,而变成“羡慕”了。世界太忙了,一躺解千愁啊。

从“鄙视”到“羡慕”,似乎暗示着变化,我们理解世界、思考社会,态度开始变得多维。在“贾家”时代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人人向往下海,商品经济正在勃兴,老傅二儿子本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混混,但乘风而起到处倒卖,自称经理摸着了商品的命脉。物质世界就此勃兴,以至于“物化”不断现实,人人行色匆匆,在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中,失去了自我停顿的时间和机会,别说“葛优躺”这样散入沙发看不见的彻底放松,就是好好坐一下凳子,都不是那么从容了。节奏过快的社会,使得人们对于一种闲适乃至于散漫的态度,有了羡慕感。今天的“葛优躺”已经是被“羡慕”的对象了。

春节将至,放假之时,“葛优躺”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姿势。不过,自然要掌握分寸,里外有别,别到公共场合例如宜家那里去躺。

常识是怎么被遗忘的

严峰



生活中有很多看似常识性的事情,却常常被复杂化。今年 1 月 15 日,有个小伙子在杭州萧山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,并把无人机拍摄到的一段客机飞行视频上传到网上。

从这段短短 8 秒的视频来看,这架客机距离无人机只有百米远的距离。当天,网上这则新闻炒得非常火热。随后机场公安介入调查,并锁定相关嫌疑人。

不过在网上,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不一致。有网友看了视频直接指出,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。也有人质疑警方介入调查这一举动。

我的一个玩无人机的朋友来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,我一口回道,当然要查!机场附近不能放飞无人机,难道这不是常识吗?!你真当自己是鸟啊,想飞就飞!

也有网友认为,这个小伙子的举动只是有点出格,并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后果,若对其处以法律惩罚就有点过了。他们甚至将此事跟“裸射击摊被审判三年半”相提并论,担心政府会一刀切,从此不再让无人机上天。真是杞人忧天啊!

那天,我儿子听说这件事后,非常着急地说,这个人要抓起来的,他这样做太危险了!万一撞上飞机怎么办?

我不明白,连我 9 岁的儿子都懂的道理,为什么成年人却不懂了呢?

福克纳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、诗人。他非常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。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有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和思考。

《坟墓的闯入者》是他的部长篇小说,讲的是 16 岁白人男孩契克帮助黑人路喀斯洗脱杀人罪名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中,镇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路喀斯是凶手,契克却认为在查清事实

真相前,不能光因为路喀斯是黑人就认定路喀斯是凶手。他凭自己的观察和对路喀斯的了解,判断路喀斯没有杀人嫌疑。是像他爸爸和舅舅那样的愚蠢的中年男人武断地判了路喀斯有罪,就因为路喀斯是黑人。

最后,契克在小伙伴艾勒克·山德和老小姐哈伯瑟姆的帮助下,打开死者的坟墓,发现了另一具尸体,从而证明了路喀斯并非杀人犯。

在这本书中,福克纳通过赞扬白人男孩契克的成长,谴责了白人成年人面对种族问题时的冥顽不化。他在给编辑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说,“如果种族问题让孩子们来解决,他们早就解决了。”

小契克似乎也赞同这样的观点。“通过观察,他发现老黑人艾富拉姆似乎比自己的舅舅和爸爸更有头脑。”因为老黑人艾富拉姆对他说,“孩子和女人,他们的脑袋不是装得满满的。他们听得进别人的话。可像你爸和你舅那样的中年男人,他们不会听的。他们没有时间,他们忙着找事实。”

他这里所说的事实,并不是契克要找的那个事实,而是能够坐实路喀斯杀人的事实。就因为路喀斯是黑人。

虽然福克纳写的是美国的事情,可是今天,我们的身边也在发生这样的事,而这些事在孩子看来却是再简单不过的,是孩子一眼就能看穿的。

为什么呢?我想并非因为孩子就真比成年人聪明,而是因为孩子心无杂念,所以才耳聪目明。

孩子的耳朵、眼睛都还没有被坏的习性所污染,他们听得进不同的声音,而成年人容易先入为主,常把自己的偏见当成经验,以致做出一些违背常识的举动。

只要懂得尊重常识,这个在萧山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的伙子,就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。

理性与惯性

姜泓冰



上周某日,有朋友焦急地找来,说晚报记者写了文章,建议对民办初中也采取电脑摇号招生,不得选拔;或者规定自主招生生源的民办初中不享有示范性高中的“名额分配”计划,以此激励更多孩子就近入读公办初中,少点补习、赶考。孩子今年小升初的朋友情绪激动:“如果是真的,我家不是白投入这么多补课费、孩子也白辛苦了?难道又要去拼学区房?还是只能拼爹?太不公平了!”

查得文章是旧文,又搬出很多理由来说服朋友不要轻信,她仍然宁信其有:“家长群里说得有鼻子有眼,记者不是有小道消息,就是替政府出台政策来吹风的!”明明,她家境优越,孩子成绩不错,进一所排名中上的学校毫无问题,却在纠结焦躁中脱口说:“进不去某校怎么办?她以后的人生就完了!”

这一周,“学生课业负担过重”,再度成为两会上上海代表委员的热点话题之一,市委书记感慨“孩子们太苦了”,给出了净化整顿教育培训市场、不让资本左右教育、绑架教育的推进减负“新药方”。听到这样的消息,那些被补课掏空了腰包、心疼孩子补课辛苦的家长会有一阵认同和欢腾。也有人仍是焦虑不安:“补课还是有效果的,没有专业机构难道让家长给学生上课?”“你敢为了孩子现在的快乐而拿他们的未来竞争做赌注吗?”……

有调查显示,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,中小学生在课外补课者占 70%以上,教育培训是最兴旺的朝阳产业,补习价码年年上涨,家长们一面愤愤于补课机构的黑心黑肠,迷惘于补课的效果究竟如何,一面宁愿自己节省用度,一掷千金万金,将

哪怕满心不情愿的孩子送进大小课堂,“短板”科目当然要补,擅长的科目更要超前学才能保住优势,第二名指望通过补习变成第一,第一名因为恐惧会落到第二而继续补习。

2016 年两会,因为市委书记的关注和政府持续一年的投入和用力,上海的儿科门诊萎缩、孩子看病难现象大大缓解,还为全国的儿科建设发展破题带了个好头。也因此,在被点名之后,因为多头管理、责任不明而多年乱象环生的中小学课外补习市场能够在 2017 年得到整治,秩序转好,乃至形成长效机制,甚至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,为同样混乱的全国各地培训市场的治理作出示范,也是可以期待的。

不过,期望以此一举为孩子“减负”,恐怕失之简单了。

今天中国的父母,都是被贫穷的恐惧、竞争压力和不安全感驱动着,高速奔跑了 30 年的一批人。即便国家经济总量已成世界第二,即便都市中一部分家庭积累起的财富已足够让下一代衣食无忧,对于教育和成长也能滔滔不绝论述得“绝对正确”,但化为行动,那样刻骨的焦虑与奔跑的惯性,依然阻止了他们对于人生自由的认知和选择力。在这个时代和东方等级文化土壤里滋生的课业负担过重,已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、心理问题,短期之内,怪圈无解。不论怎样改革、治理,都不能急于事功、急于求成;政府与社会都当积极有为,求“缓”并且求“解”,不可能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。

在社会发展领域,认识到有些问题比较复杂,也许我们才会更有耐心和理性,理气顺肠,等待时间显效,逐渐缓解乃至治愈我们的狂躁或焦虑症。大人没毛病,孩子才能真减负、健康成长。